

城市空间与文化专题研究

空间正义、政治经济学批判与正义建构 ——亨利·列斐伏尔空间正义思想研究

魏 强

摘 要: 列斐伏尔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中最早对空间和空间正义问题进行理论阐释的学者。他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出发,对作为资本与权力合谋的城市空间、体现政治霸权与消费控制的国家空间、造就资本霸权与区域冲突的全球空间的非正义性问题进行批判和揭示,并从争取城市权利、重建社会主义差异空间、创造具有生活风格的文化革命三方面提出了推进和实现空间正义的可能性路径。系统阐释列斐伏尔的空间正义思想,对于解决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的空间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借鉴意义。

关键词: 列斐伏尔; 空间正义; 城市权利; 差异空间

作者简介: 魏强, 哲学博士, 长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 湖北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马克思恩格斯城市正义思想及其当代意义研究”(19Q049)。

中图分类号: B151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3969/j.issn.2095-042X.2019.06.011

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 1901—1991)是法国当代著名的思想家和哲学家,也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中最早对空间和空间正义问题进行理论阐释的学者,他的代表作《空间的生产》(*The Production of Space*)被认为是空间分析的经典之作。尽管列斐伏尔没有对空间正义的内涵做出明确具体的界定,但他对城市权利的呼吁、对差异正义的倡导,为空间正义的探索提供了有益的思路。系统梳理列斐伏尔的空间及空间正义思想,对于当代中国城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一、空间、正义与空间正义

(一) 空间是社会的产物

人们对空间的认知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古人对空间的理解仅限于空洞的物质器皿,即物质在其中运动发展的区域或场所,空间是自然的产物,是不依赖于人的意志而独立存在的物理空间。自笛卡尔以来,空间被认为是人类认知的产物,是感性的直观形式,“空间不是什么从外部经验中抽引出来的经验性的概念”,而是“一个作为一切外部直观之基础的必然的先天表象”^[1]。空间是借助于人的思维才能存在的纯粹的精神空间。

在考察了空间范畴的历史发展以后，列斐伏尔提出了“社会空间”的概念，即空间是社会性的存在，是被生产出来的存在。很明显，列斐伏尔在这里强调的是空间与社会的关系，一方面，空间由具有观念、情感的人的实践活动所生产和创造；另一方面，现实中的空间又呈现着人与物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因此，“（社会）空间是（社会）产物”^{[2]26}包含着以下四点含义：其一，自然空间正在消失。自然空间本是社会空间生产的基础与前提，但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尤其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作为基础与前提的自然空间却总是被破坏，成为生产力操弄的工具，并逐渐消逝在人类的生产实践中。与此同时，自然空间也正消失在人类的思想中。对于“什么是自然？我们该如何重塑人类运用毁坏工具介入之前的本真自然”^{[2]31}等问题已不再能引起人类的重视，自然空间只是被看作各种社会空间生产的原材料。列斐伏尔认为，人类必须反思自己对待自然空间的思想与行动，并用制度来约束破坏自然空间的实践行为。

其二，任何一个社会，或者确切地说任何一种生产方式，都生产着属于它自己的空间。社会空间不是空洞的思想抽象，而是现实的实践活动对自然空间不断改造的结果，特定的社会空间包含着相应的社会关系和生产关系。不同的社会关系和生产关系又生产着不同的社会空间，并打上特定的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烙印，成为统治阶级维护其统治地位的重要工具。

其三，作为产物的社会空间既是具体的又是抽象的。之所以是具体的，是因为它由特定的社会生产模式所塑造，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历史性结果，涉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之所以是抽象的，是因为它是社会生产关系存在和生产的场所，是其本体论基础，特定的社会空间形塑着特定的社会形态，涉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社会空间是具体与抽象的辩证统一，就如同马克思的交换价值一样，是一种“具体的抽象”。

其四，空间的历史就是空间生产的历史。每一种特定的空间生产方式生产着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空间，特定的社会空间又建构着独特的社会形态。随着空间生产方式的历史转换，必然伴随着社会空间的变更和社会形态的更替。列斐伏尔以空间生产方式为标准，将人类社会迄今为止社会空间的演变历史划分为以下六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绝对的空间，即原始社会的那种处于自然状态的空间；第二阶段是神圣的空间，即由暴君统治国家的社会空间；第三阶段是历史性空间，即以希腊城邦和罗马帝国为代表的政治国家的社会空间；第四阶段是抽象空间，即资本主义主导下的政治经济空间；第五阶段是矛盾性空间，即新旧全球化时代的分裂导致对立的矛盾空间；第六阶段是差异性空间，即强调和尊重同一社会中的差异性以及不同空间的连接与组合^{[2]48-52}。

（二）从正义到空间正义

空间或空间生产并非价值中立的，而是蕴含或呈现着特定社会的特定意识形态和价值准则，因而必然伴随着正义或不正义的问题。可以说，“正义”是人类社会的美好理想与永恒价值追求。为了实现这一理想，多少仁人志士奉献了宝贵的生命，多少思想先贤绞尽了脑汁，但时至今日，对于什么是正义依然充满着争议与歧见。不管怎样，对正义的追求和拷问，依然是当今时代经久不衰的理论话题。随着历史语境和时代主题的重大转变，正义范式也随之发生变换。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和不断扩散的城市危机，便产生了一种关于地理、正义和城市状况的思潮，即列斐伏尔的城市权利思想，这在正义概念的空间化演进进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在列斐伏尔看来，对空间正义的追寻，首先体现在对空间资源配置过程中不公平、不平等现

象的批判。通过夺取城市权利的斗争,让更多的弱势群体取得更大的社会权力和更多的社会资源来重塑生活于其中的城市空间。“进入都市的权利所指的,就是一种有待实现的总体性”,即“城市居民的权利,还有那些在交通、信息和交易的网络与流通中出现而结成(在社会关系的基础上)的团体的权利”^{[3]13}。空间正义就是维护所有公民与团体公平地、平等地使用空间的权利。因此,城市是继民族国家确立公民权和人权以后,又一个寻求扩大民主、平等和正义斗争的特殊空间和场所。其次,对空间正义的追寻更为重要地体现在空间生产中公民空间权益的实现。城市是为人的空间,属人的地方,每一个居住在此的公民,都有公开公正地参加城市空间生产过程的权利。因此,空间正义要求弱势群体以争夺城市空间为核心,通过谋求更大的控制权来掌控空间生产的过程,实现生产领域的社会公平和公正。当然,空间与政治的联姻,使空间正义问题不仅呈现在城市空间,更展现在国家空间和全球空间,不管在哪一维度的空间中,政治权力在其中都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在列斐伏尔看来,就国家空间而言,要建构差异性的社会主义空间,消除抽象空间生产带来的政治异化与空间断裂,实现空间政治权利;就全球空间而言,要拒斥资本霸权,遏制全球空间生产带来的资本无限扩张、地区发展不平衡等问题,用实际行动调节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利益。

二、对资本空间生产非正义性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在列斐伏尔看来,伴随着从空间中物的生产到空间本身的生产之转向,空间和空间的生产已经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延续其生存与发展的根本路径。然而,空间是被占据了、被管理了的具有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的对象,尽管从其表现形式上来看是中立的、公平的;空间的生产也并非无任何价值倾向的一般生产,而是统治阶级或某个政治集团基于自身利益所造就的生产关系再生产的过程。基于此,列斐伏尔从城市空间、国家空间和全球空间三个维度对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的非正义性进行了批判。

(一) 城市空间:资本与权力合谋的产物

列斐伏尔把马克思主义对工业社会的历史批判理论改造为城市社会的空间批判理论,从空间与生产的双重互动中理解现代城市问题^[4]。

首先,公共享用的自然资源成为具有交换价值的稀缺商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空间转向,使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出现了令人费解的一幕:曾经是稀缺商品的日常生活用品、交通工具、工业材料等变得相对充裕,而一些原本丰富的自然资源如花园、空气、河流等却成了稀缺商品。理解这一怪象的关键在于,自然空间被纳入了资本增殖的生产体系,那些以前不是商品的东西如空气、青山、绿水等,经过文化工业的占用和加工后变成了休闲空间。这一空间不仅具有使用价值,而且成为具有交换价值的商品,“自然成为交换价值和商品,被购买和出售”^{[5]158}。作为具有文化象征意义的地点,这些非工作性和非生产性的休闲空间不仅积极促进着资本价值增殖的实现,也显示出比日常生活更具魅力的假象。当然,这些休闲空间生产的主要目的是服务于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扩张,同时也是国家权力精心策划的结果。国家通过公共基础设施的改造、节假日的精心安排以及相关政策文件的出台来实现空间市场化,体现着空间生产的政治与意识形态性。

其次，不动产的动产化使乡村城市化，掠夺了农民的空间权利。在早期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土地作为原材料的重要性被忽视，建筑业的重要性也远不及服务业和金融业。随着资本生产的空间扩张，作为追逐剩余价值手段的土地被纳入资本主义生产体系，成了住房建筑业必不可少的原材料并且构成住房价值的一部分，资本主义由此进入了不动产动产化的空间生产阶段。城市空间土地资源的极度短缺决定了广大的乡村地区成为大规模城市化所需要的土地资源的重要来源，于是，城市空间生产的规模延伸到了乡村。资本和权力的勾结一方面使农民丧失了作为生活资料来源的土地，另一方面作为剩余劳动力的农民又难以共享城市化发展带来的成果，严重侵害了他们的空间生存和发展的权利。其主要原因在于，资本和权力的相互利用导致政府的城市规划和建造过于强调城市空间的经济功能，忽视了其社会功能与文化功能，使城市空间生产缺失了正义之维。因此，列斐伏尔告诫人们，“没有比城市规划和‘城市主义’更坏的敌人，它们是资本主义和国家用来操控碎片化的城市现实和控制空间生产的战略工具”^{[6]15}。

最后，资产阶级对空间生产的控制，导致了城市空间的平面化、视觉化和同质化。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资本的空间生产让原本具有立体感、历史感的城市空间变成了无差异、无具体内容的抽象空间。三维的现实空间被抽象还原成由圆规、三角板、铅笔等绘图工具所描绘的二维平面图，并由此成为空间规划与生产的参考和依据。其二，几何的、线性透视图的原理证明了视觉化逻辑的合理性。“可以说，这种空间（二维的想象空间——引者注）预设和暗含了一种视觉化逻辑”^{[2]98}，一切非视觉的东西，比如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威严能够通过视觉的方式（如高大耸立的建筑物）来表达或成为视觉的一个象征形式。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之深，已经不仅仅是使资本变成景观，而是用视觉化特征来掩盖景观的同质化以及隐藏在景观背后的为资本增殖和维护政治统治的真实目的。其三，这种平面化、视觉化的抽象空间是一种受意识形态控制的产物。建筑师对一块块空间的规划与设计并不是基于自身专业素养的自由创造，而是既要符合当权者的政治要求，也要迎合开发商对资本利润的追求。“被建造的空间——一种金属和玻璃的透明——高声地诉说着权力意志和所有它的诡计。”^{[6]88}资产阶级凭借可重复性和可再生产性的同质化空间来最大限度地实现资本增殖，同时也最大限度地巩固和加强政治意识形态对空间的操纵与管理。这样，城市空间抽象化了，成为具有纯粹经济功能和展示统治需求的客观对象，城市空间是资本和权力合谋的产物。这种合谋必然导致国家空间层面政治霸权的出现。

（二）国家空间：政治霸权与消费控制

首先，资本主义空间政治霸权加剧了资本的掠夺性积累。空间与权力的互相勾结导致资本主义的空间生产既是资本追逐剩余价值的需要，同时也是资产阶级政治意识形态体系不断空间化的过程。资本增殖让资产阶级的政治矛盾通过空间生产不断得到扩散与缓解，与此同时，也相应延长了其政治统治；政治意识形态的空间化使空间资本能够借助权力的力量进行资本积累，暂时缓和了资本主义经济的矛盾与危机的发生。空间生产的政治化与政治统治的空间化直接促使了资本主义空间政治霸权的形成，反过来，空间政治霸权又强化了资本的掠夺性积累。空间政治霸权使空间生产遭到政治权力的支配，资产阶级通过对空间的占有和支配既驱动了资本的掠夺性积累，又实现了对国家的政治统治，空间成为统治者、压迫人的工具，具有等级化、碎片化、专制化的特征。当然，在空间生产向全球扩张的时代，维护资本主义空间政治霸权的经济手段已不再是机械化大生产的工业资本，而是以货币体系为主的金融资本。金融资本对空间政治霸权地位的确立

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同时也越来越具有易变性和掠夺性,不可避免的金融危机使成千上万的工人面临着失业和贫困的悲惨境况。

其次,资本主义的空间生产造就了中心—边缘的空间等级布局。列斐伏尔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心和中心性是根本性的。……中心的本质恰恰是它们生产边缘的活动。中心挑拨并放逐边缘,它们维持并抛弃边缘。决策中心(比如权力、权威、信息和知识中心)将那些不服从权力的事物置于远离它们的地方”^{[6]116}。这种中心—边缘的空间等级布局一方面反映着城乡二元对立的空间等级体系,即城市的发展往往建立在对农村土地、矿产等资源的掠夺上。城市是国家发展的中心,农村是生产资料的输出地,这种对国家空间不同功能分区的划分,拉开了城乡发展差距,加剧了城乡贫富分化,呈现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另一方面,这种空间等级布局彰显着从上到下的政治秩序的等级性。“处于同一层面的空间中的场所被一种垂直的叠置替换了,即被一种遵循着自身权力场所路线的等级结构替换了。”^{[6]225} 中心地区支配和控制着处于从属和依附地位的边缘地区,权力和财富集中在中心地区,压迫和赤贫聚集在边缘地区,呈现着地区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性。因此,资本主义在各个层次上目睹着它们制造出来的矛盾:普遍性的空间爆炸。

最后,国家空间对消费活动的控制导致空间异化,个人成为被操纵的玩偶。资本主义的空间生产通过向公共空间的扩张和侵蚀,使公共空间转变为集体消费的场所,呈现为商品堆积的景观社会。这个景观社会控制着人们的需求和消费,使每个个体被淹没在巨大的商品浪潮中,丧失了个人的自由意志与创造性。正如居伊·德波指出的,“景观让活着的人们服从于它,原因是经济已经将人们完全降服。景观无非就是为了自身而自行发展的经济”^{[7]7-8},在这个时候,“商品已经成功地实现对社会生活的全部占领。……人们看到的世界就是景观的世界”^{[7]22}。真实世界隐退了,虚假世界浮现了,人们的空间生活异化了。国家空间通过伪造的真实世界遮蔽了资产阶级社会中突出的社会矛盾,背负解放使命的无产阶级被重视日常生活和消费活动的中产阶级所取代;国家空间通过消费活动实现了对全社会的控制,消费欲望吞噬了人们的理智,控制着人们的生活,消磨着人们的意志。因此,国家空间的生产不仅是资本追逐剩余价值的过程,也隐藏着资产阶级统治社会的政治目的。此外,列斐伏尔认为,国家空间对消费领域的操控主要通过媒介的宣传来培育个体的消费欲望,进而达到对个人乃至整个社会的控制。“宣传不仅仅提供了一种消费的意识形态,而且更主要地创造着‘我’这样一个自我实现的消费者形象,在这样的行为中消费者认识到自己并与他自己的理想相一致。”^{[8]90}

(三) 全球空间:资本霸权与区域冲突

首先,空间生产的全球扩张导致资本霸权。资本的本性使得价值增殖成为其唯一目的,但有限的空间界线阻碍了资本的无限积累,引发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为了延缓或缓解经济危机,资本必须克服各种空间障碍,不断开拓新的空间,建立新的市场关系,走向全球空间的组织与再造。资本主义通过跨国公司和跨国银行、全球流动的电讯和能源以及日趋成熟的现代交通体系构成了以世界城市为节点的全球生产和销售格局。一方面,资本主义的空间生产方式和各种社会空间组织进入世界市场,在世界范围内流动和运转,为资本流通所需要的全球空间的形成创造了必要的前提条件;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利用技术和资金方面的优势,控制和侵占着欠发达地区的空间资源,将其纳入资本增殖体系,维护着资本霸权在全球空间的统治地位。列斐伏尔指出,资本主义抽象空间的力量“似乎碾碎了它面前的任何东西,这种空间展现了一种刨子,推土机或坦克的功能”^{[2]285}。

其次，资本霸权的逻辑使得全球空间的发展呈现极度不平衡性。一方面，表现为资本流动的不平衡。资本想要获得价值增殖，必须突破空间限制，在全球范围内流动。但这种流动并不是平均的，无任何价值取向的，而是服务于资本的空间政治霸权。也就是说，发达国家拥有更多的资金、技术、人力等资源，并运用政治权力对全球空间的产业进行重新布局，操控着全球范围内的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以获取巨额垄断利润。而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既缺乏充分发展所需要的紧缺资金，同时又承担着资本危机空间转移的代价。另一方面，表现为全球空间关系的等级化。虽然空间生产在走向全球化，全球经济趋于一体化，但由于生产和资本在全球空间的集聚与集中，使得发达国家在这一空间中总是扮演领导者与指挥者的角色，而发展中国家一直处于被领导与从属的地位。反过来，这种等级化的空间关系又加剧了资本流动的不平衡性。正如曼德爾在《晚期资本主义》一书中指出的，“整个资本主义制度……表现为具有不同生产能力层次的一种等级结构，并且是以各个国家、区域、产业部门和公司的不平衡而又彼此结合的发展的结果出现的”^[9]。

最后，发展的不平衡性导致了区域间的矛盾与冲突。全球化是资本空间扩展与重组的必然结果，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实施剥削和控制的具体表现形式，但这并不意味着区域化的终结。相反，区域化对全球化的抵抗以及因全球化而引起的区域间的矛盾与冲突，成为战后资本主义全球发展的一大鲜明特征。“如果空间已经成为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场所，那么它事实上也开始成为众多矛盾丛生之地。”^{[6]85} 比如为抵抗西方文化渗透而引发的中东战争、为争夺石油资源的控制权而爆发的海湾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等都是这种抵抗的一种现实反映，其背后的实质无非是空间的同质化与碎片化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一方面，资本权力作为整体进入全球空间，逐渐抹除了所有空间的区别和差异，使其成为同质化的抽象空间；另一方面，由于劳动分工以及其他方面分工的需要，作为整体的抽象空间又被分割得支离破碎，呈碎片状。资本主导下的全球空间生产，不仅导致了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空间资源的掠夺和压榨，也不断制造着全球与区域之间、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对立与冲突，使整个世界呈现一种非正义状态。

三、空间正义的建构：城市权利、差异空间与文化革命

列斐伏尔的空间正义理论不仅反思与批判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空间非正义现象，同时也从城市空间、国家空间和全球空间三个维度提出了推进与实现空间正义的可能性途径。

第一，就城市空间而言，每个人必须争取城市生活的权利，实现对塑造城市空间的更大控制权。在列斐伏尔看来，“真实的空间的问题构成，在关于都市的现实的认知中，是一个重要的方面，而且可能是最核心的方面”^{[3]20}，城市空间生产及其非正义性问题是城市社会的一个基础性的、核心的问题。想要改变这种生活状况，“我们必须首先改造空间”^{[2]190}，而对城市空间的改造主要表现为对城市权利的获取。列斐伏尔认为，所谓城市权利，“一方面包括使用者有表达他们对在城市中活动空间和时间的观点的权利，同时也涵盖使用中心地区和特权地区，而不是被打发塞进种族聚居区（对工人、移民、‘边缘人’甚至‘特权阶层’）的权利”^{[5]34}。也就是说，城市权利首先是一种问题表达和主体要求，是日常主体对在城市发展中自身利益被侵犯、被掠夺或者难享城市发展成果却要承受城市发展代价与不幸的一种抗争和辩证表达；其次是一种获得城市身份、保障不被排除在城市发展之外、平等分享城市权益的主体资质和制度安排；更为重要的是，

城市权利还是一种人们能够控制空间生产过程,有效参与城市发展、决策与管理的主体行动和实践方式。基于此,城市权利最本质的内容是一种作为城市主体而进行的城市行动。

就城市权利的深层建构而言,列斐伏尔提出了三个层面的空间有机互动构成的空间辩证法。其一是空间实践(spatial practice),即人们在一定的思想观念指导下,通过实践活动来建造和改变城市空间;其二是空间的表达(representations of space),即现实的城市空间总是表达着占统治地位的精英阶层的构想,是精英阶层主导下的实践产物;其三是表达的空间(space of representation),即一种具有象征性的想象空间,常人有可能也有权利通过空间来表达自己的愿望,通过对空间的更新与再造来表达和实现自己的权利和要求^[10]。列斐伏尔认为,在资本主义抽象空间的统治下,人们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更具正义性的空间的想象和追求,而是一直通过行动实践性地创造和构建着多样性、异质性的差异空间。比如无家可归者在争取获得住房的权利,同性恋者在争取安全的公共空间等。就像爱德华·W.苏贾所呼吁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城市生活中处于不利地位的每个人,都要站起来采取进一步显著措施,控制他们置身于其中的非正义的城市空间之社会生产”^[11]。因为只有当政治斗争集中到城市空间的社会生产上时,其产生的革命冲动才有可能发展为彻底改变日常生活的反资本主义斗争,也才有可能实现按照他们的心愿来建设城市的权利。只有这样,才能构思和重建一种完全不同的城市:不再重蹈全球化、城市化资本横行所造成的可怕的困境。

第二,就国家空间而言,必须发挥工人阶级的革命性作用,“自下而上”地重建社会主义差异空间。在列斐伏尔看来,每个社会形态都有与之生产方式相对应的社会空间,资本主义社会是同质化的抽象空间,社会主义社会是倡导多样化的差异空间。因此,想要改变生活,首先就必须改造空间,“如果未曾生产一个合适的空间,那么‘改变生活方式’‘改变社会’等都是空话”^{[12]47}。如何才能生产一个所谓合适的空间?列斐伏尔认为首要的任务在于发动以工人阶级为基础的革命行动。与马克思认为工人阶级应该是且必须是唯一的革命的现实主体不同,列斐伏尔发现,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的空间生产已经渗透进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甚至深入到每一个个体的日常生活中,因而包括工人阶级、农民、城市贫民、中产阶层等在内的社会各个阶层都成为潜在的革命力量。因此,要形成以工人阶级为基础,与其他多元化的社会阶层联盟的空间革命化行动。

就阶级斗争的根本目的而言,关键是要摆脱资本主义“自上而下”的空间生产对日常生活的控制,重建人民大众“自下而上”的自我管理的社会空间。列斐伏尔指出,资本主义的抽象空间是一种可量化的、可互相交换的、均质化的空间,同时也是一种控制性、征服性、压迫性的空间,要想克服这种空间的矛盾并建构一种新的空间结构,就必须“将先前由‘自上而下’生产出来的社会空间,重构为‘自下而上’的空间,这意味着普遍性的自我管理,亦即在各种不同的层次上,完成各单位与生产秩序的自我管理”^{[12]56}。在社会主义空间中,空间的生产过程由国家或资产阶级的统治转向对空间的集体占有与自我管理,空间的生产目的由交换价值的优先性转向以使用价值为主导,空间的生产方式由行政命令指挥转向以社会需求为标准。因此,“社会主义的空间将会是一个差异的空间”^{[12]55}。至于差异的社会主义空间究竟是什么样子,列斐伏尔并没有过多着墨,只是将其特征归结为任由我们自己去体验和创造的开放性和可能性。正如一些评论者所言,“列斐伏尔对抽象空间的批判,远远多于他对其进行改变的希望空间的论述”^[13]。

第三，就全球空间而言，必须进行文化革命，以创造和实现真正的民主。在列斐伏尔看来，资本逻辑推动下的全球空间生产引发了全球空间地理失衡、空间等级秩序以及同质化与碎片化的矛盾等全球非正义现象，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路径在于变革空间结构，消除资本主义政治霸权。因为只有消解了空间生产中的资本逻辑、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才能抵抗资本主义抽象空间的生产，重构一种公平、正义的空间生产过程和空间结构。为此，列斐伏尔提出了通过文化革命来变革空间结构，进而达到追求差异权利，建构差异的社会主义空间，实现真正的自由民主的目的。所谓文化革命，“不是建立于文化基础上的革命，也不是文化自身的目标或它的动机；我们的文化革命的目标与方向是，创造一种不是制度的而是生活风格的文化；它的基本特征是哲学精神的实现”^{[8]203}。也就是说，文化革命的目的不是建立一种新的政治或经济制度，而是对人的生活方式的根本性变革。列斐伏尔认为，在资本对人的统治已经深入日常生活的全球化时代，单纯的政治意义上的革命已失去效力，必须从文化平台着手进行细致入微的变革。

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否定政治革命。在列斐伏尔看来，20 世纪后半叶以来，现代社会的危机已经遍布全世界，从经济到政治，到文化，再到价值，成为全球层面的现代社会的基本存在方式。因而政治革命与文化革命的关系并不像列宁时代那样是后者从属于前者的关系，也不是现代西方社会所主张的后者先于前者的关系，而是一种相伴相生的关系。“政治和‘文化’变革以一种复杂的方式同时发生，不存在决定论、因果关系或终极因果关系意义上的一个先于另一个。相反，存在着一种相互矛盾着的复杂关系，一方有时引起、促进和加强另一方，或者有时遮蔽、麻痹甚至中断另一方。”^[14]因此，只有把文化革命与政治革命充分结合起来，才能创造一种不受资本逻辑和官僚社会所控制的自由空间。从微观方面来说，要打破同质化的生活节奏，创建一种具有否定性、批判性的自己管理自己，集体承担责任的新的生活方式；从宏观方面来讲，要发起以工人阶级为主导的革命性空间行动，建构一种“自下而上”的空间管理模式。

总之，列斐伏尔对当代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以及对社会主义差异空间的探讨，对于进入空间生产聚集时代的当代中国来说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当前我国城镇化已经从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从重视工业园区扩张、住房和商业设施开发向重视城市整体生活环境，包括公园、体育设施、文化设施等城市公共活动空间建设的转变。研究和借鉴列斐伏尔等西方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可以为我国城镇化进程中涌现出的城市问题提供反思，实现新时代我国城市的均衡、充分发展，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当然，列斐伏尔的理论也有其历史局限性，比如它局限在人类施动的社会空间做伦理道德文章、对人自身的完成性认识不足等^[15]。因此，在我国城镇化率即将突破 60% 这样一个重要历史节点上，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的借鉴应该建立在批判性反思的基础上，同时也应当给出我们自己对时代和实践的回应，这是我们作为学者的历史使命和根本任务。

参考文献：

- [1] 伊曼努尔·康德. 纯粹理性批判 [M]. 邓晓芒,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1: 28.
- [2] LEFEBVRE H.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M].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1991.
- [3] 亨利·列斐伏尔. 空间与政治 [M]. 李春, 译. 2 版.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
- [4] 刘怀玉, 张一方. 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哲学方法到当代空间化社会批判方法 [J]. 学术交流, 2019 (3): 34-46.
- [5] LEFEBVRE H. Writings on cities [M].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1996.

- [6] LEFEBVRE H. The survival of capitalism: reproduction of the relation of production [M]. London: Allison & Busby, 1976.
- [7] 居伊·德波. 景观社会 [M]. 张新木, 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7.
- [8] LEFEBVRE H. Everyday life in the modern world [M]. New York: The Penguin Press, 1971.
- [9] 爱德华·W. 苏贾. 后现代地理学 [M]. 王文斌,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4: 142.
- [10] 陈忠. 主体性的微观走向与空间权利的城市实现 [J]. 哲学动态, 2014 (8): 57-65.
- [11] 爱德华·W. 苏贾. 寻求空间正义 [M]. 高春花, 强乃社, 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79.
- [12] 列斐伏尔. 空间: 社会产物与使用价值 [M] // 包亚明. 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3.
- [13] 乔治·瑞泽尔, 古特曼. 现代社会学理论 [M]. 6 版.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163.
- [14] LEFEBVRE H. State, space, world [M]. Minnesota: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9: 295.
- [15] 陈慧平. 列斐伏尔的社会空间理论批判 [J]. 人文杂志, 2017 (9): 17-24.

Spatial Justic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Justice Construction

—On the Spatial Justice Thoughts of Henri Lefebvre

Wei Qiang

Abstract: Henri Lefebvre is the earliest contemporary western Marxist who interprets the issue of space and spatial justice theoretical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tical economy, Henri Lefebvre criticizes and reveals the problems of global space injustice such as the urban space as the collusion between capital and power, the national space embodying the political hegemony and consumption control and the global space causing the capital hegemony and regional conflicts, and puts forward the possible path of promoting and realizing spatial justice from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striving for urban rights, rebuilding socialist space of difference and creating a cultural revolution with lifestyle. Interpreting the spatial justice thoughts of Henri Lefebvre systematically is of great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to solve the problems of spatial imbalance and inadequacy in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society.

Keywords: Henri Lefebvre; spatial justice; urban rights; space of difference

(收稿日期: 2019-08-25; 责任编辑: 陈鸿)